

董瑞兰 著

《文艺学习》的 广义修辞学研究

非外借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广义修辞学视野中的当代文学
期刊话语分析——〈文艺学习〉(1954—1957)研究》(14YJC751007)

《文艺学习》的 广义修辞学研究

董瑞兰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 / 董瑞兰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5-21202-4

I. ①文… II. ①董… III. ①文学语言—研究 ②汉语—修辞学—研究 IV. ①I045 ②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006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

著 者 董瑞兰

责任编辑 黄 睿 卢文婷

编辑热线 025-8359699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9 字数 311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1202-4

定 价 6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谭学纯

我曾借《文艺研究》的一角谈及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的学术逻辑：

全球视野中的当代修辞学，多方位地介入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本土风景中的当代修辞学研究对此做出了反应。本土反应的阶段性学术影像呈现的研究热点，可以理解为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召唤结构”，每一次填入“召唤结构”的中心话题，都会召唤同类学术文本的批量生产和读者关注点的相对集中。避免“召唤结构”堰塞湖与学术研究创新性的要求互为因果，驱动了学术研究的修辞学转向，其学科能量主要来自两个学科：文艺学和语言学。

文艺学科作为“转向”的中坚力量，符合国内学术当代走向中文艺学科思想活跃的特点及其在理论建设中的惯常身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内学术研究的几次转向，都由文艺学发端。转向的标志是频繁变换填入“召唤结构”的主题和关键词，“修辞学转向”是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术填空。

“修辞学转向”的主要联袂力量是语言学研究，受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国内语言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形式感和技术路线，这对于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修辞学研究来说，面临着不同的学术选择：或者割断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向语言学研究的技术倾向靠拢，以维系现行学科目录中修辞学隶属语言学下位学科的归属感；或者承续中国修辞研究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同时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滋养，向共享学术空间突围。

修辞学研究突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限于狭义的修辞技巧分析,较多地倾向于广义修辞观。^①

从广义修辞学视角研究《文艺学习》,是上述学术背景下的知识生产。

选择期刊作为广义修辞学研究对象,是因为:文艺研究进入成果密集区,需要进行新的空间开发,期刊研究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价值洼地。期刊在聚合轴上为修辞研究汇聚文献资源,在组合轴上为修辞研究提供信息选项。期刊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期刊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思想动员及其传递的国家意志,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后果?本书尝试做出学术回应。

选择《文艺学习》作为广义修辞学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份以文学和艺术为话语场域的刊物从诞生到停摆,不足四年。从停刊到复出,冷冻了三十年。刊物成为关注焦点,是20世纪50年代,作者阵容包括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是高关注度的作家、诗人、理论家、批评家、学者、出版人,期间刊发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注度很高的作品和理论,如邓友梅《在悬崖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也刊发过针对高关注度作品的高关注度讨论。讨论的言内行为是可控的,不可控的是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引人瞩目的事件如关于《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的讨论,始料未及地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刊物从主动发表干预生活和探讨理论问题的作品,到多少有些被动地组织批判和自我批判;从因为“发表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向读者道歉”,到“检讨刊物的资产阶级方向”,温和的讨论转向话语暴力,是学术表达向非学术表达的剧情反转,刊物“被中断”的无奈及此后漫长的空窗期和主编的命运,^②是剧情反转的延伸。当文艺衍生出非文艺的假设时,《文艺学习》为表达一个时代的文艺经验和政治热情保留了集体记忆。挖掘尘封的记忆,重返历史风景,必然注入对历史的当代审视,如何描述共和国诞生初期意识形态宣传和文艺创作与接受的关系中《文艺学习》的身份、功能及修辞策略?本书也尝试做出学术回应。

① 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② 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黄秋耘:《风雨年华》,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两书各有几十处回忆《文艺学习》的文字,作者分别是《文艺学习》主编、副主编。

二

学术研究是减少重复性、凸显区别性的游戏。

区别于近年渐成新热点的期刊研究的学术面貌和观察角度,本书从期刊文献话语审视期刊,汇聚《文艺学习》从1954年出场到1957年与《人民文学》合并而退场期间的全部文献,重点分析《文艺学习》画页解说词、青年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话语、读者来信话语、编者话语。全书主体部分第二至六章,均以关键词句为观察窗口,例如从人称代词分析《文艺学习》创作主体身份与话语修辞,从“反问/否定”分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批评语句的修辞结构,从“应该/不应该”分析禁止句型的修辞特征,从“大人物”与“大批判”分析话语的逻辑和批评的力量如何被权力重新定义。《文艺学习》是兼创作、理论与批评于一体的话语集散地,也是影响广泛的话语频道。聚焦话语,尤其是聚焦关键词句,是一个独特的学术观察角度。

区别于同样聚焦关键词句的狭义修辞学研究,本书走出了“就语言谈语言”的分析路径,选用广义修辞学研究范式,从“话语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修辞功能三个层面)的立体架构和“表达者—接受者”(修辞活动两个主体)的互动行为中进行综合考察。

从修辞功能三层面考察,本书注重关键词句在目标文本建构的话语系统中是否具有支撑文本整体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功能,或者说,关键词句指向的话语世界本身,可分析性是有限的,话语世界不是抽象概念和抽象语义构筑的世界,而是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定义了的此时此地的话语世界。米兰·昆德拉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认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组成人物编码的若干个关键词,在另一个人的存在编码里有不同的意义。^①每个人(例如特丽莎和托马斯、弗兰茨和萨宾娜)的存在编码不同,决定了组成人物编码的关键词的意义不同,这些词的词典语义被文本重新释义。^②后者以新的语义形象

①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28页。

② 关于“词典语义”和“文本语义”的精细论述,参见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8页。

召唤新的话语组合,躺在词典释义系统中的词语,一旦在文本中活起来,即被锁定为广义修辞学在文本中跟踪的目标语词。其语义往往从不在语用现场的固定义位溢出,在语用现场的自设义位重新出场,^①释放推动文本叙述和参与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能量。本书第三章即据此观察与解释关键词“悬崖”之于《在悬崖上》的标题语义、文本叙述要素与修辞结构、人物形象义素与道德评价、主题投射方式与文本修辞的意义。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如何减少关键词句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我主张用比较或替换的方法检验:所选目标文本中的关键词句,删除或替换后,这个文本是否仍然成立?文本内外交际系统中人物的精神世界是否被改变?如果删除或替换关键词句,目标文本仍然成立,则被删除或替换的关键词句只是局部的生动形式;如果删除或替换关键词句,目标文本不能成立,文本内外交际系统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被改写,则从反面证明所选关键词句推动文本建构的叙述能量,以及参与主体精神建构的能量。

从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考察广义修辞学视野中的期刊研究,动态地审视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在场及其身份转换:当作者以表达者身份发言时,编者和读者都是接受者;当读者以表达者身份发言时,编者和作者都是接受者;当编者以表达者身份发言时,作者和读者都是接受者——编者话语即便以“告读者”“答读者”的形式呈现,作者和读者也都是编者共同的接受者,这意味着《文艺学习》“道歉—检查—检讨”的话语升级,实际上是在编者—作者—读者的关系中逐层弱化编者话语权的修辞策略。

全书将关键词句微观分析和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把握相结合,考量历史语境中文艺“生产—消费”与修辞行为的互动、展示文艺研究和修辞研究边界移动开放的场域,为换一个角度观察与解释 20 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思想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探索一种可能性。

① 谭学纯:《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中国比较文学》2009 年第 2 期;《语用环境中的语义变异:解释框架及模式提取》,《语言文字应用》2014 年第 2 期。

三

书中附录 1—3,是指向书名关键词的文献汇集,同时作为副文本^①,参与本书正文本的学术建构。

附录 1 穷尽《文艺学习》从 1954 年创刊到 1957 年停刊期间的全部文献,包括六个版块:(一)封面、画页、插图、封底设计,(二)文艺创作,(三)文艺理论批评,(四)文艺知识普及,(五)读者来信,(六)编者的话。附录 1 的目录层次可展示《文艺学习》当时的全貌。

附录 2 汇集 1954 到 2018 年间与《文艺学习》相关度较高的研究文献目录。六十多年来相关研究匮乏,其中的期刊论文均为本书作者的前期试水,这一方面凸显了本书选题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本书的研究具有前期基础上深化细化的可能。

附录 3 辑有《广义修辞学》出版以来与广义修辞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献目录,因为选文依据是广义修辞研究的相关度,而不是广义修辞学研究本身,所以虽然不代表我的观点,但尊重作者的选择,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作者对本书以广义修辞学为理论资源的自我注释。所涉文献有的运用广义修辞学的系统理论,解决作者拟解决的问题;有的选用广义修辞学的局部理论,解决作者拟解决的问题;有的依据广义修辞观选择相关理论解决作者拟解决的问题;也有对广义修辞学论著的评价或批评。目录中的作者很多我素不相识,只在学术文献中相遇。相识或不相识的作者注意的是自己拟选择的理论、评价的论著,我注意的是被选用的广义修辞学理论的解释力能不能进行差异中的有限推导。从解释的有效性说,一种解释框架应该可推导。推导是一种抽象,理论上抽象性越强,可推导性越强。过度抽象可能连带过度推导,而过度推导的结果,可能弱化解释力。鉴于修辞研究的特点,我倾向于差异中的有限推导;强调差异中的推导,是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强调有限推导,是避免

^① “副文本”是由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标题、前言、序跋、告读者、插图、插页、磁带、护封及其他附属标志。参见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版,第 71 页。

过度推导的解释力稀释。解释框架可推导,是从一千片树叶中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结构,但修辞需要解释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在“共同结构”和“差异性”之间,探索解释框架的可推导性。

差异中的有限推导的另一个观察点是附录3辑录了《广义修辞学》出版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修辞研究的立项选题目录,很多选题使用“广义”的“修辞”概念。^① 这让人想到巴赫金对修辞研究瘦身的批评:“修辞学对自己要研究的课题,失去了真正哲理的和社会的角度”,主张修辞研究从“书房之内”向“书房之外”延伸。^② 事实上,书房之外的信息不可能真正被书房之内的言语技巧截断,书房之外的景观总会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书房之内的纵深,屏蔽书房之外的世界,无啻于折叠书房之内的空间。巴赫金批评沉于“细微末节”的“书房技巧”,与国内语言学界诟病修辞研究“小儿科”同声相应。虽然巴赫金的批评是针对长篇小说话语的论述,但理论主旨同样切合本书正文及附录3的文献,这可能也是本书及附录3文献的理论选择比较多地偏向广义修辞的原因。不过作为《广义修辞学》作者及理论与实践的推动者,我并不因为上述学术文献的理论选择及巴赫金批评拘于“书房技巧”的研究,而误读偏重言语技巧的狭义修辞学。巴赫金看到了修辞研究不能限于书房之内,看到了“修辞技巧”不等于“修辞”的外延,重视“修辞统一体”,^③但巴赫金的尖锐批评,又似乎从“修辞”卸载了“修辞技巧”,所以广义修辞学的理论框架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修辞技巧。偏重“技巧中心论”和“表达中心论”的狭义修辞学,与兼涉“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兼及“表达者—接受者”的广义修辞学各自构建的学术形象各有学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共同彰显学术研究的不同可能性,并互为镜像:狭义修辞学作为广义修辞学的背景,映衬了后者的立论及其验证。狭义修辞学的学术传统,提醒广义修辞学在探索之途适时回望。广义修辞学的理论与实践,提示狭义修辞学在自我坚守中不要遮闭了面向更宽广的世界的窗口。广义修辞学的探

① 董瑞兰、毛浩然:《25年来中国修辞研究的关键词词频统计——基于国家社科与教育部社科课题立项数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②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③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索,并不意味着狭义修辞学的衰微。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的历时演化,会以狭义修辞观和广义修辞观的共时同现方式并存。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信,也都应该具有直面自身局限的理性和自觉,并勤于自我更新,敏于自我提升。

附录3搜集的文献来自不同学科,作者在相关“说明”中表示:

本书读者在附录3中,可追寻广义修辞学的研究意识(广义修辞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可考量十多年来广义修辞学融入中国学术生态的话语实践(期刊话语的修辞研究、意识形态的修辞观察、文体生成功能的修辞理路、中西文论的修辞阐释、辞格的修辞分析、中国修辞学科中的广义修辞研究等),可继续在“小同行”(修辞学作为三级学科)、“大同行”(修辞学归属于二级学科语言学)和“超同行”(交叉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以及相关的非中文一级学科,如哲学、法学)的学术共同体中,探索中国修辞研究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前沿意识。

不同学科针对不同对象的广义修辞学研究,能否激发学科内的知识生产,注视学科间的知识生产?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广义修辞研究的信息交换及其跨界生产释放的能量,如何重建二者交互生长的开放性空间?从修辞技巧延伸至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的广义修辞研究,如何操控跨界游戏?在这方面,本书作者董瑞兰读硕和读博阶段分别接受过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训练,或许有一点跨界的便利。我也一直倾向于研究生读硕和读博阶段、或博士后合作研究阶段,最好接受不同学科训练。

四

本书是董瑞兰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从2014年立项,到书稿付梓,学术读写频繁转换、辛劳的付出和获得感同在。作者保持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阅读与写作惯性,闽江学院讲台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她家庭生活之外的第二时空和第三时空。人与人的差别,往往在第一时空和第二时空之外。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庭生活,每个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都要工作(全职太太承担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工作),但每个人有

不同的第三时空。董瑞兰尊重第二时空的劳资契约,工作之余能够自我调节的,只能是以第三时空压缩第一时空。低设家庭生活的温度与浪漫指数,承接学术读写的重压,可能招致同情或不解,但可悲的不是社会用同情或不解的眼光斜视学术,而是假面学人用猥琐褻渎的方式僭越学术。如果说学界吐槽水煮学术更多的是叹惋什么样的机制使得精英游戏变味成广场舞,那么怒怼学术猥亵则反讽学术认同的价值指标,追问什么样的价值观毁损了学术正义、接纳了伪学术和反学术、推助了学术红灯区的畸形繁荣。在学术生产、学术资源、利益分配的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我为本书作者守住底线的学术辛劳感言,也为更高层次的学术要求写几句建议。

学术研究的难度常常超出初始想象,因此最后定型的文本自然会留有一些似可推进的发掘点,例如本书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人/集体”的图像语义和文学批评的“个人话语/集体话语”,是否可以深入图像叙事和语言叙事的互文性空间继续发掘,图像和语言互相指涉、互相确证、互相补充,图像再现的画面和语言唤起的图像,在相邻的位置、相继的关系中,共同参与话语的意义建构,引导话语的意义解读。如果链接话语主体“我/我们”的语义指向,考察“个人/集体”的符号自我和真实自我,“个人话语”如何被“集体话语”包装或复制?“集体”声浪中如何插入“个人”音符?很难设想拒绝集体话语资源的“个人话语”,正如很难设想完全压制个人话语经验的“集体话语”,在“个人/集体”的二元秩序之外,是否存在暧昧空间或叠合影像?书中分析作为读者的“工农兵”身份认证,能否关联文本人物“工农兵”的身份建构和作为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方向”?“工农兵”是由劳动阶层+军事集团构成的身份类别,是建立与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的人力资本,“工农兵”身份认证的实质是政治认同。但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方向”和把握这个方向的文艺工作者的“工农兵”身份不具有对等性,工农兵的形象塑造,工农兵作者和读者参与文艺生产与消费,以“工农兵”趣味审视文艺,势必要求《文艺学习》寻找契合“工农兵方向”的表达,或者说契合那个时代的表达。就此放大观察,如何解析共和国童年《文艺学习》的刊物使命?书中分析编者自我反思的话语升级,能否探寻《文艺学习》试图在文艺干预生活和文艺干预政治之间构筑某种平衡的努力?这也许是更值得细察的编者修辞策略?文艺和政治,以不同的方式干预生活,两种干预生活的交叉处,也是文艺与政治的叠合处,因此文艺与政治不宜简单切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文艺的政治干预强势出场,是文化资本博弈的结果,但可能在历史循环

的意义上,对同一文艺产品给出“香花—毒草—重放的鲜花”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评判。深入这个解释空间,有更高的学术含量,也极具理论诱惑。如果说在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的时间节点,不太好处理,那么能否作为一种期待:在本书的延伸探讨——同为董瑞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1949—1999)话语研究》最终成果中呈现为逻辑化的学术叙述?

有期待,才有再出发的学术冲动和话语欲望。

前 言

《〈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意在阐明：

1. 《文艺学习》是谁？《文艺学习》研究价值何在？
2. 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积累、理论构架和逻辑思路如何？
3. 《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的可能性如何体现？

这些分别指向本书的研究对象、理论来源和研究思路。

提及《文艺学习》，身边极少人知道它是谁，出生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并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最有可能亲密接触过它。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论著中开始注意它，然后去还原它的全貌。笔者从 2008 年开始发表《文艺学习》相关论文，至今十年有余。《文艺学习》研究价值，谭学纯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肯定它“身价不菲”，笔者则从研究的周边环境略作补充。

研究《文艺学习》还来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困惑与问题意识。洪子诚教授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直面当代文学“平面化”叙述方式和学术研究中的矛盾与裂缝，提出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可以看作是中国左翼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演化：它与另外的文学力量、文学成分的紧张和复杂关系；它确立了怎样的文学纲领、路线；以及如何建构它的‘当代形态’”“这一具有‘先锋’意味、在某些时间里表现了相当的活力的文学，是怎样走向‘制度化’，怎样失去‘弹性’而变得僵硬的？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吗？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文学史叙述和当今文坛上已失去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它的经验，它曾有过的以粗糙、不和谐去抵抗‘腐败’（文学的和社会的）的

努力,是否还是一种重要参照,一种不应忘却的遗产?这些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①

作为文学言语行为发生车间的文学期刊,它难以逃脱由文学体制演化、文学经典重评和文学资源洗牌等系列要素连接的场域。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对“文学场”的生成有过深入阐述。^②《文艺学习》研究着眼于对当代文学发生时言语行为的观察,包括文学“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在说些什么当中我们做些什么,以及经由说些什么我们做些什么”,即“经由说 X,我做了 Y”或“经由说 X 并且做了事情 Y,我做了事情 Z”。^③ 以下系列问题值得深思: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失去弹性而形成话语表述的程式化,如何面对文学传统,如何构建它的当代形态,如何参与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如何反映当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学与政治联姻的文化形态?

本书尝试以《文艺学习》为个案,从微观辐射开去,直面真实的文学,正视历史的真实,进行反思与超越。《文艺学习》研究的牵绊,既受文学思维惯性的推动,又受到学科大生态的影响,甚至已触及某些敏感地带。从外围绕了一圈,返回《文艺学习》本身,《文艺学习》研究如何突破?

笔者的硕博教育经历,为《文艺学习》研究的广义修辞学转向提供了可能性。

广义修辞学,是以理论著作《广义修辞学》为标志,以《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广义修辞学演讲录》《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为系列论著建构起的思想体系。^④ 实际上,广义修辞学理论定位与框架设计建立在《接受

①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初版,2015 年增订版,“初版自序”。

②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1-262 页。

③ [英]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55 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译者导言”。

④ 广义修辞学代表性论著有:《广义修辞学》(谭学纯、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初版,2008 年修订;《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谭学纯),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广义修辞学演讲录》(谭学纯),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谭学纯),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修辞学《人与人的对话》^①基础上,历经十多年的前期准备,大致分为:话语研究阶段、接受修辞学阶段和从话语层面向文化哲学层面延伸研究阶段,具体表现在: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和唐跃先生对文学话语研究的“两栖性”参与,到90年代初我和唐跃、朱玲合著《接受修辞学》,直到世纪之交写作《人与人的对话》,我们走的基本上都是一条跨学科研究的路子。……我们把反复思考的《广义修辞学》的理论切入点最终确立在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因此,我们理解的《广义修辞学》和修辞界有学者谈到的“广义修辞学”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认为:广义修辞学,不是狭义修辞学经验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②

广义修辞学的理论构架和逻辑思路,聚焦于“修辞功能三层面”和“修辞活动两主体”:

层面1——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

层面2——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

层面3——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

主体1——修辞活动中的表达者:话语权和表达策略

主体2——修辞活动中的接受者:解释权和接受策略

“三个层面”,着重探讨修辞以何种方式参与话语建构、文本建构和主体建构,据此将修辞分析纳入“话语方式—文本方式—一人的存在方式”的层级构架。这是广义修辞学基于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正视多学科构建的大生态、面向多学科共享的学术空间的一种框架设计,竭力实现修辞学研究在不同层级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互补。

“两个主体”,旨在拓展接受修辞学的研究视野,建立表达论(话语权和表

① 这两本著作分别是:《接受修辞学》(谭学纯、唐跃、朱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增订版;《人与人的对话》(谭学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修订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初版自序”。

达策略)、接受论(解释权和接受策略)和互动论(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双向互动的宏观微观建构)的系统开放格局。“两个主体”贯穿于“三个层面”,支持基于话语行为发生与理解的修辞学研究,并与之形成立体开放性体系。

广义修辞学之“广义”,“意在更多地关注学科大生态中相关学科的同类研究,促进自己的学术调整、思维拓展和研究深化;同时关注大生态中刺激自我质疑、自我否定的他性参照,尤其是其他学科经验的参照”“强调通过不同学科经验的挪移和互渗,包括通过不同学科经验方式自我表述系统的整合,拓展研究空间”“在接受学科限定又超越限定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新的生长点”。^①

本书《〈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立足“修辞功能三层面”和“修辞活动两主体”,文本呈现“语词—语句—语篇”的语言学面貌。除“第一章《文艺学习》总体概览”外,其他五章均以“《文艺学习》X的广义修辞学分析”为标题,观察对象分别是《文艺学习》画页解说词、青年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话语、读者来信话语、编者话语。各节均在广义修辞学层面展开话语分析。全书语料封闭,兼顾系统与个案,综合史料描述与学理探究,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提供修辞学的观察与思考。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是广义修辞学近年持续关注的话题。人类以语言的方式出场、在场或退场,“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② 话语主体以修辞的方式证明自我的存在。阅读当代文学期刊的过程是一个品评当代人生存状态的过程,是一个体验生活、反思生活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学期刊话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反映了话语主体言说什么、如何言说、为什么这样言说、为什么不说,以及如何书写个人的生命风貌。关注修辞、关注文本、关注主体精神家园,是本书的立场,书中主要观点只是笔者接近文学、看待学术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本书副文本指附录、注释、参考文献等,与正文形成在场共生的互文关系。法国热拉尔·热奈特指出:“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最单纯的、对外围知识最不感兴趣的读者难

①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3页。

②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卷首语。

以像他想象的或宣称的那样总是轻而易举地占有上述材料。”^①副文本被纳入文本叙述,以在场的方式为文本内和文本间语义流动提供一种思路。“共生”是指副文本与文本共存,共同体现笔者的研究立场、态度和评价。

附录1《〈文艺学习〉全部刊载分类目录(1954—1957)》,旨在收录《文艺学习》全部刊载文本,涵盖所有的栏目,包括封面、画页、插图、封底设计;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批评;文艺知识普及;读者来信;编者的话等。本书读者可概览《文艺学习》概况,相关研究者可引证核查所需篇目。若能在史料现场“蛛丝马迹”中寻求更多的研究灵感,乃学术幸事。“拯救旧期刊”“保护当代史料”,我们一直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叙述。

附录2《〈文艺学习〉相关度较高的文献目录(1954—2018)》,收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作家回忆录、文学词典和文艺报刊中直接提及《文艺学习》且与《文艺学习》相关度较高的文献。读者既可概览《文艺学习》接受成果,又可了解《文艺学习》研究现状。

附录3《广义修辞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成果目录(2001—2018)》,收录自2001年《广义修辞学》初版以来国内学术界广义修辞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成果。笔者希望编排一场小型广义修辞研究的学术聚会,便于读者理解《广义修辞学》理论与学术界使用的“广义修辞学”的异同点,让读者感受到:本书关于《文艺学习》修辞研究已解决了什么问题、在多大程度进行了理论的推导和实证、为什么表现出这样的修辞意识与叙述面貌,还有哪些问题在修辞研究视域中呈现“区别性”“高显示度”特征并为笔者的后续深挖提供可能性空间。

本书注释和主要参考文献是笔者在正文之外有意搭建的一块阅读区域,为读者提供预先审视和理会的机会,也是笔者与文献作者、本书读者交流的场所。笔者对这些论著所涌现出的智识表示尊重,并对相关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修辞活动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建构审美现实的言语活动”,是广义修辞学对修辞活动的基本定位。《〈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出版之后,只是作者表达的阶段性完成。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修辞学研究在更深广意义上的开拓,笔者一直“在路上”,很大的动力来自目标读者的阶段性反馈。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